



學林春秋

三編 上册

张世林 编

朝華出版社



學林春秋

三編 下冊

张世林 编

2

朝華出版社

学林春秋

三编

上册

张世林
编

朝华出版社

学林春秋

三编
下册

张世林
编

朝华出版社



學林春秋

三編
上冊

學林春秋

編冊
三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林春秋:初编、二编、三编/张世林编.

- 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

ISBN 7-5054-0639-6

I. 学… II. 张… III. 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1421 号

学林春秋三编(全二册)

张世林 编

朝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100044

北京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22.75 印张 525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48.00 元

ISBN 7-5054-0639-6/G·0189

如发现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2000.2.2

三联韬奋图书中心

No. 4195625

卷 首 语

干工作有时会上瘾,特别是当你被自己编织的理想所罩住,心中的憧憬十分强烈的时候。我编《学林春秋》这套书的感受就是如此。最初,我负责编《书品》杂志时,听到读者对杨伯峻先生写的《我和〈左传〉》一文很感兴趣,颇受启发,很想多组织一些老先生撰写介绍自己研治学术的心得体会的文章,隔三差五地刊发出来,既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又能解决缺好稿子的问题,这完全是出于编刊工作的考虑。但后来这项工作虽未能真正做下去,可又总装在我的心里。其后,隔上一段时间,便会听到一些熟识的老先生辞世的消息,每一次都给我以强烈的刺激,怅然若失,深为没能请他们把宝贵的治学经验总结下来而感到惋惜。同时,心里有一种欲望,一种冲动,更觉得是一种责任,应该赶快动手,把还健在的老先生们的宝贵的治学经验抢救下来。否则,就真的来不及了,那可是我们民族的损失啊!而且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有了认识,接下来就该有所思考,有所行动了。我确实是这样做的。首先我想到应该从健在的老一辈著名的专家学者做起,先请他们把自己宝贵的治学经验总结并记录下来,以免悔之晚矣。不知跑了多少路,写了多少封信,打了多少次电话,总算催来了四

十篇文章。这些老先生的年龄绝大多数都在八十岁以上。经过编辑加工,以《学林春秋》为名,将书发排了。按说做到这儿,我本该可以喘口气了。但我的脑子偏偏不肯停下来,我在想,编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固然是为了把这批老先生们的宝贵的治学经验及时地抢救下来,为后人治学提供借鉴和帮助。同时,正值 20 世纪即将过去,正应该对本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加以总结。既然如此,便应该重新制定规划。在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除了上面那批老先生以外,现在年龄在六十以上八十以下的这批学者,也应该及时地加以总结,因为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为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要是能把他们中的著名的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和体会一并及时地记录下来,庶几总结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时,便可以留下一批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了。

这样一想,我又被自己所描绘的前景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乎,忘记了疲劳,忘记了艰辛,又开始了新一轮竞赛。既然是总结 20 世纪中国的学术史,就应该在 2000 年新的世纪到来之前出版,剩下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了,但工作量肯定要比前面大多了。

怎么办?说干就干!好在是个人的认识,个人的行为,不用向别人请示和汇报,当然也不能耽误本职工作。好在有了前面那编的工作经验,思路、体例、要求一仍其旧,只是先要确定下来撰稿人的名单,这可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颇费周章的。我先根据自己对学术界的了解,将年龄限制在六十岁以上(含六十岁),开列了一个名单,然后再去征询一些先生们的意见,由他们提出一些补充,最后便按照这张名单,结合每位先生的治学所长,拟定文章的题目。做好以后,便开始具体的联系组稿工作了。基本上还是老办法,外地的采取函约的方式,本地的则多为登门拜访,当面约稿。名单上一共有九十多位。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况且他们可都是大名鼎鼎

鼎的学者,教学、科研和社会活动是很多的,不是为我一个人服务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反正是该去跑的都跑了,该去信的都去信了。多数先生对我的这一想法很赞赏,亦很支持,都答应写稿,但能不能按时交稿,则还要靠催。还有一些先生,他们确实太忙了,打电话找不到人,写信去没时间回,最后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也答应写稿了,却迟迟交不来稿。每逢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比谁执着和坚定了。这对一个编辑的组稿能力也是一个考验。我以为做这件事主要是为了给广大的青年学人在如何治学上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同时也是为了更切实地总结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这么堂而皇之的理想和抱负,只能使我更加执着和坚定。于是乎,我便使出了做编辑应该具备的“精诚所至”式的催稿本领,不厌其烦地打电话或写信去催稿。已说不清打了多少个电话,写了多少封信了。冯其庸先生很支持我的想法,可他事务缠身,社会活动太多,血压还高,虽答应写稿,却一直没交来稿子。按说我对冯先生的处境是了解的,不应该再催促了。况且,我已经催过了,可谓尽心了。但我不这么想,因为我只请冯先生一人写《我和〈红楼梦〉》,缺了这一篇,就少了一个方面啊!所以我总是过一段时间,便给冯先生打一个电话,有时虽只是问候先生的身体,但先生知道我的意图,只好放下其他事务,抱病先给我赶写出了《我与〈红楼梦〉》,总算赶上发排了。裘锡圭先生为人非常严谨,凡他答应的事是不会不办的。我是在 1998 年年底左右约先生写《我和古文字研究》的,他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写。第二年他说要去台湾讲学五个月,准备在那里动笔,写好后寄给我。我一直在等待。直等到先生都回到北京了,还是没收到。我忙去看望先生,师母告诉我,去台湾前,没计划安排太多的课,本可以有时间写稿。但到了台湾后,许多大学慕名而来,非要请先生去讲课,结果安排得满满的,根本没时间写稿,只好

回来后再写了。其实回来后也不得其闲,又去香港、日本参加活动。我知道先生确实没有功夫,眼睛有病,还不能过于疲劳。但缺了先生的文章,我没法向学术界交待啊!只好硬着头皮,给先生打电话请安。最后先生又是开了夜车,把稿子给赶了出来。师母告诉我一直写到凌晨四五点才完。我真是于心不忍啊!李学勤先生应该说是举世公认的大忙人,特别是他自领导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以后,更是很难找到他。虽然他也是很早就答应给我写稿,我明知他不可能按时交稿,但也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忙。我打电话,经常是他老伴接,告诉我在外面什么地方开会。要想找到先生委实不易,却经常在报纸或电视新闻上看到先生在外地的某一个考古工地上。先生确实太忙了,夏、商、周断代可是个大工程啊!为此他老伴劝我这次“放过”他。我却说,写学术回顾也是一个大工程,李先生也是非参加不可的,反过来请她帮我催着点儿先生。就这样,先生总算抓紧时间把稿子写完寄给了我,不过,不是从本市,也不是从外地,而是从美国直接寄给我的。先生是利用去美国参观访问的机会才忙里偷闲给我写出来的。田余庆先生的文章是最后一个交给我的,交稿的时候,全书都已经看完一校要出二校样了。原来,我最早当面约先生时,他是答应写的,但一来先生非常谨慎认真,二来血压一直很高,身体承受不了,所以又说不能写了。虽然我为此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又是去拜访,不想放弃,但考虑到先生的身体情况,加之时间也很紧了,只好先放下了。但由于田先生在史学界中的地位和影响,有些已经写稿的人或了解先生的人,总要问我:“田先生写了没有?”如徐苹芳先生,就不止一次地问过我,说一定要让田先生写,他不写可不成。其实我也知道不成,并把这些话及时带给了先生,但先生还是婉辞。这之后,徐先生去台湾讲学五个多月,回来后又问起这件事,当时稿子都已经下厂排字去

了。经徐先生这么一问,加之我本来也不甘心,于是又去田先生府上拜访,旧话重提,并告之,不答应则无法向学术界和读者交待。先生见我又来了,知道拗不过我,只好答应了。等我拿到稿子后,赶紧插入已排出的校样中,我长期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

当然,也有的先生不吃我这一套,最终是我拗不过人家,只好放弃了。比如蔡美彪先生,本想请先生写《我和中国通史》,无奈先生谦虚得很,怎么也不同意。再有姜伯勤先生,先是去信约稿,后又多次打电话,但也是一直未允。今年3月份,开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在北京见到先生,我又当面请他写稿,但先生是坚辞不允,我也只好屈从了。楼宇烈先生,我也是当面约的稿,本以为和先生挺熟的,殊不知先生不肯写,虽再三拜访、电话、写信,终是未果。另外,还有一些先生,由于各种原因,也未能写稿,如叶朗先生、袁世硕先生、刘家学和先生等,虽不情愿,终无可奈何矣!于是,我想编书也和其他艺术一样,总是会有一些遗憾的,追求圆满,也只能是我们的一种理想。

不过,经过我这一番艰辛的劳作,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催回了八十多篇文章,厚厚的一摞,近一百万字。接下来就是编辑加工了,每一篇文章都要认真地看一遍,遇有弄不明白的地方,还要打电话向作者询问,还要搞清楚每一位作者的出生年月日,以便按年龄先后排定次序,最后,将四十一位七十岁以上的学者的文章编为《二编》,余下的四十三位六十岁以上的学者的文章编为《三编》,加之经过增订后,《初编》所收年龄在八十岁以上的学者的文章达四十四篇,三编合计共收文一百二十八篇,总字数为一百五十多万。为了能够在2000年以前将这三编保质保量地一齐推出,我和该书的责任编辑李占领兄,真是用了革命加拼命的办法,为了能够保证质量,尽量减少错别字,我们在每次校样经校对人员校过之

后,一分为二,各再通校一次,一共看了两遍,第三校时,又互换校样,再通读一次。在这一段时间,每天下班后,我和占领兄都要拿几篇校样回家晚上看,遇到星期六、日,更是要事先准备好要看的校样。这样,每天晚上都要看到很晚,直看到稿子都从手上掉下来。每个星期六、日上午,我都要送孩子去外面学习,孩子进了学校,我则跑到校外的一家小公园里,坐在大椅子上看校样,直看得浑身凉透,大有“箪食、瓢饮,回也不改其乐”之“信念”。不过,苦在其中,乐亦在其中矣!之所以能如此,我相信只要读者能认真读一读上述这些大学者们的文章,他们在人生和治学过程中经历过的千辛万苦,特别是政治上的迫害和压抑,才真叫人体会到说不出的苦啊!只有备尝艰辛而又努力奋斗的人,才能够成就大学问,大事业。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最好的说明。相形之下,我们除了倍受鼓舞和激励,还能谈什么呢?不过,我还是要真诚地感谢占领兄,他为本书的出版,做了那么多具体、细致的实际工作,没有他那么认真负责,真不知要出多少错。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主编这套书,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虽然抓回了这一百多篇文章,但由于鄙人才疏学浅,加之孤陋寡闻,肯定漏掉了许多应该收入的有成就的学者,这个责任当然在我,希望知情的人能够多给我以批评和提示,好让我今后有机会加以改正并补就。

邓云乡先生和顾学颉先生,他们两位最先把稿子写好寄给了我,却先后因病故去了,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悼念。

张世林

写于1999年11月29日深夜

封面题字·顾廷龙

装帧设计·王铭基	责任编辑·李占领
----------	----------

朝華出版社

目 录

上 册

我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	乐黛云 2
------------------	-------

新人文主义比较文学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提出了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把比较文学定位为“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它就必然处于 21 世纪人文精神的最前沿。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文化沟通,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以至武装冲突,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这种 21 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正是未来比较文学的灵魂,也是一切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灵魂。

我和明清经济史研究	李龙潜 38
-----------------	--------

明清时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它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中国近代史和明清经济史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明清经济史得到解释的。如果不了解明清经济史,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就不能理解或理解不深。因此,学习和研究明清经济史,就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帮助我们认识中国为什么不走上资本主义而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帮助我们理解和掌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